

在新的世界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 施玮和山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孙基立

提 要：海外的华人作家在作品中详尽地反映了新移民的生活环境，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传统和现代的对话和思考。本文选择了山眼、施玮这两位海外华裔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探讨以下问题：首先，在小说中，异国的文化环境怎样给予新移民女性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思考自己成长环境和传统，其次，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怎样承载和表现了她们的思考。文章先介绍了中西方文化中对自我的探索和世界经典文学中对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并分析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然后比较施玮的“红墙白玉兰”（2008）中的秦小小和山眼的“维纳斯的春天”（2014）中王薇妮的形象：她们的配偶选择，爱情经历，生存状态，从而反映华裔女性在异国生活的现状和她们对异国境遇中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的思索。然后分析两部作品的语言写作风格，最后通过文本的分析，思考今日商业文化对华裔女性生存状态和独立精神生活的冲击和挑战。

关键词：华裔女性；法国文学；中西文化比较；商业文化；现代化

Reconstruction of the Self-Identity In a New World: Women's Figures in Shi Wei and Shan Yan's Literary Works

Sun Jili

Abstract: The life of immigrants in the host countries and their struggl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ir search for their own identity is a popular theme for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In this work, we chose to analyze the women figures in two novels of two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han Yan and Shi Wei. We explor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of all, how the overseas environment provided the writers with an original angle to reflect upon thei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traditions to the western culture; secondly, how their language and writing styles conveyed these reflections. This work is structured in 3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we introduced women's self-exploration, their quest of financial/spiritual independence in noted novels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which include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works (e.g. *Therese Thesqueyroux* (1927) of Francois Mauriac); in the second part, we compared the main Female

figures: Qin XiaoXiao in Shi Wei's work "The Red Wall And The White Magnolia" (2008), and Wang Weini in Shan Yan's work "Venus's Spring" (2014). We analyzed their romantic experiences, living condition, choice of partner, observation of the western lifestyle and communities, and their reflection on their Chinese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in the host country. In the third part, we analyzed these two writers' language styl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orylines. We also compared them with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rtists or writers. This study showed women did gain independence with the feminist movements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this progress was reflected in Shi Wei's work in Qin Xiaoxiao's living condi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US. Nevertheless, in the past 20 years, women faced a new risk of losing their intellectual and financial independence due to the imposing commercial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omparison of women's figures in Shi Wen and Shan Yan's work is a window into the degradation of life quality, financial security,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 all over the world. Commoners (not only women) are struggling under a competitive, interest-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It also impacted new immigrants' adaptation, and stimulated their reflection on their self-identity, the western/eastern culture contact, gender role, an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s and modernity.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women; gender role; French literature; Eastern/western culture contact; commercial world; modernity

1. 中西方文化中对“我是谁”的探索

中国庄周梦蝶^[1]的故事，以象征的手法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我是谁？我生活的环境是真实的还是梦幻？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中很早就存在，在古希腊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2]中也阐述了类似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地穴的比喻：一群被囚禁在黑暗的洞穴中的人，从来没见过真实世界中的光明，他们以为世界就是黑暗和光明世界传来的光影所构成。

在这项研究中，作品中的女性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生活的环境是

梦境还是现实？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面对自己的母语文化和异国文化的冲突交融，在夹缝中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

在许多女性主义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是在近代发生的事，美国妇女在1920年才获得和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在同时代的法国文学中，法国诺贝尔奖得主作家莫里亚克在1927年首次出版的著名小说《黛莱丝·德克罗》^[3]讲述了一位法国外省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黛莱丝·德克罗的故事：她如同法国传统妇女一样，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和自己不爱，没有任何心灵交流和共同语言的丈夫贝尔纳结婚，生活沉闷没有自我，遭受丈夫的心理

折磨，最后她在一种类似梦游的潜意识状态篡改了丈夫的心脏病药方，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摆脱一种她以正常方式无法摆脱的受奴役的生活，莫里亚克对黛莱丝的心理描写非常细致精彩：她篡改药物的时候行为无法受理智支配，她如同梦游一般，像强迫症患者一样下意识地做了此事。当时妇女的绝望境地体现无遗。莫里亚克描写的法国外省有深厚宗教传统，莫里亚克本身也是受传统教育的天主教徒，^[4]他自称为写作的天主教徒，而不愿意被称为“天主教作家”，这个自我定位说明他是更愿意作为一个有天主教信仰的普通人去观察，体会传统的天主教影响下的社会环境，而不是通过文学去宣传天主教既定教义。在这部小说中，他揭示传统女性的身份只意味着生活在以“家庭”为名义的牢笼中，在丈夫的统治下存在。而所谓的“家庭”，是无视女性内心感受和自由意志，由门当户对的原则决定，由家庭长辈安排的牢笼，而妇女在其中的作用只是生儿育女，照顾各位家庭成员，家庭像机器一样碾碎女性的个性追求，才华和自我意识。徐真华（2013）对黛莱丝追求真实的自我，自由和幸福的抗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这种追求既不是肉欲上的，也不是物质经济意义上对囚笼家庭的反叛，而是精神上的对自身独立人格的追求，这使黛莱丝不同于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5]（1856）中的爱玛：爱玛试图逃脱无真正爱情的家庭生活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肉欲，和物质经济意义上的欲求。

同时在中国的同时代，巴金的著名的描写封建大家庭的系列小说^[6]《家》（1931）^[7]《春》（1938）^[8]《秋》（1940）中对妇女在大家族命运传统中没

有婚姻自主权，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悲惨命运进行了类似的描述。这三部小说在呼唤女性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尊严，掌握自身命运，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又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此可以看到，在上世纪初，妇女的命运在各国都类似，而且都有经典的文学作品展现。而到了新的一个世纪，妇女的命运有何种改变呢？

2. 海外华人女性的对自己身份的新视角

一个世纪以后，妇女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她们同时面临新的，全球化和商业价值蔓延所带来的问题，而且全球化带来了人口流动，让她们有机会亲身体验异国的生活。西方海外华人作家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离开自己的根和环境，可以以比较和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母国文化，他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常常是生活在几种文化的冲突比较中，这给予了她们更多的自由和主动性去思考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们在这里选择研究的是两位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作品：施玮的小说^[9]《红墙白玉兰》（2008），^[10]山眼的小说《维纳斯的春天》（2014）

2.1 “红墙白玉兰”：理想化的女性生活

这本小说在2008年出版，作者施玮是著名海外作家，女主角秦小小是一个才女，由于种种误会无法和自己真正爱的人杨修平结合，在赌气之余嫁给了一个有少许华裔血统的美国人柳如海，并一同去了美国定居。柳如海非常爱她，但是她和杨修平彼此之间都无法忘怀。杨修平的婚姻

生活也不幸福，所以她的心灵有许多挣扎。柳如海虽然一直知道妻子和杨修平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一直用宽容的和宗教式的爱维系着这段婚姻，也给予妻子足够的空间去思考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秦小小真心诚意地终于选择了柳如海。秦小小的女性意识从认识爱情开始：对杨修平的爱使自己心中的女性意识第一次真实地苏醒，虽然作为诗人，她常将自己当女性来描绘，但是那是一种朦胧的女性意识，与女权运动中“摆脱男性束缚”是两种不同的性别意识。同时她的才华受人敬仰，她选择爱人也完全自由，无论是杨修平还是柳如海都尊重爱慕她，小心翼翼地不触碰她的心灵禁区，她唯一需要说服的是她自己的感情和良知。

杨修平和柳如海分别代表了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爱情表达方式：杨修平代表了一种传统的东方的，内敛含蓄，背负许多社会责任的感情生活状态，他的两次婚姻也和爱情无关：第一次是娶了养父母未婚先孕的女儿紫烟，为的是报恩，给妹妹的孩子一个名份，第二次是在爱情失意的心境下，半推半就地娶了一个心机深重，将婚姻当做向上爬阶梯的平庸女子晓红。他在许多环境下都是一个被动承担责任，而不是主动追求真爱的人，这和他从小是孤儿，寄人篱下地在养父母家生活的背景有密切关系。

而柳如海代表了一种有西方特色的，直率真诚，外向开朗的爱情表达方式，而且有理想化色彩：他的生活环境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氛围：母亲是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父亲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是著名的数学家，家境优裕，他和小小结婚后的生活环境也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两层小楼，整洁宽敞的厨房，浴室，汽车和宽

敞的庭院，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作者描绘他的形象：“（小小）每次小别重逢，都会惊讶于他的俊朗，明亮，他就像这块土地一样，蓝天白云，简明诚实，不分昼夜地喜悦着”^[11]。“他从来都这么诚实，让她（小小）反而有点尴尬，其实她心里是欣赏美国文化的，这种文化并不是在中国时了解的好莱坞文化，而是一种清教徒文化，虽然商店都是九点关门，周日关得更早，这让她无法接受，总是笑话美国是个大农村。但那些傍晚和孩子，妻子一起散步，周末在院子里除草的普通丈夫们总是让她十分感动”^[12]。柳如海虽然知道妻子的心事，却以一种宗教式的宽容，给予了她充足的尊重和理解。他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美的男人。

作者对柳如海和美国社会的描写具有浪漫主义特色，而对东方社会以及对杨修平的描绘则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作者详尽描述了女性在争夺男友时使用的小诡计，小虚伪，小心机，将人性中的勾心斗角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秦小小最后的选择柳如海不仅仅是道德和宗教伦理的选择，同时也是对另一个理想世界的追求。

然而，西方世界有宗教传统的保守中产阶级生活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在莫里亚克的小说“黛莱丝德克罗”中对法国保守天主教社会有比较详尽的叙述，当时法国南部外省外观上可能给人以庄重，体面，宗教道德感强，注重家庭的印象，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假面具，里面没有真实的心灵交流，这样的环境是埋葬女性真实个性和灵魂的坟墓。美国的清教传统社区生活在许多其他文学作品中有非常复杂的呈现，例如霍桑的小说^[13]《红字》（1850）描写基督教清教的家庭观念和社区文化，女主人公海思特·白兰有类似

黛莱丝那种无爱婚姻，作者霍桑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他对清教文化，对罪与救赎的深入思考：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新英格兰，基督教清教社区的氛围压抑沉闷，人们彼此监视，虽然他们重视婚姻的忠诚，但是主要用宗教教条来维系婚姻，而不是将婚姻建立在心灵的彼此相通，灵魂的深刻对话。这和莫里亚克在小说“黛莱丝德克罗”所描写的法国南部外省的天主教社区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秦小小眼中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是初到的新移民常常有的对异国文化的理想化诠释：只看到表象，或者只看到少数人的生活状态，然后将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代入异国的情境中。秦小小的心理描绘了这种新移民常有的现象。

同时，小说也通过中国文化对柳如海的吸引力，神秘感，说明异国文化产生的吸引力是双向的，西方人也可能对中国存有人间天堂的想象。但是由于小说中对中国社会环境的描写比较倾向现实主义，柳如海对中国的想象在小说中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但是秦小小对西方国家的理想化描述在小说中却无法看出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描述。

从《红墙白玉兰》这本小说中，我们发现海外华裔作家可以以西方宗教文化作为载体，描述一种近似人间天堂的理想，将女性置于被保护尊重和爱恋的中心。小说通过“异国”来铺陈了一幅女性的理想化生活环境，秦小小富足，被爱恋尊重，才华得到尽情发挥，她真正的挣扎是来自内心的良知和宗教的质询，而不是像黛莱丝德克莱中所描述的女性对外部环境的反抗。

作者施玮在其后期的作品《叛教者》^[14]（2016）中，对宗教文化则有更

现实，更客观深入的描述，不同于她在《红墙白玉兰》中对异国宗教生活有近乎完美的浪漫主义描写。这反映了作者在其海外生涯中，逐渐从宗教文化的表象进入其深层内核，对宗教文化中矛盾，黑暗的一面有了更深入的体察和感悟。

2.2 维纳斯的春天：在现实中挣扎的女性

加拿大作家山眼的小说《维纳斯的春天》在2014年获得台湾道生出版社征文奖。作者山眼同时著有描写移民生活的小说集^[15]《青春作伴》（2019），山眼常常在北美华人中很流行的“世界日报”刊登连载小说。写作主题以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华裔男女为主。在小说《维纳斯的春天》中，女主角王薇尼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她是形象设计师，电视台的时尚节目主持人，在小说开头，她母亲来看她，却因为她没时间陪伴，最后死于意外。她和男友马克同居，他们的恋情是现代西方个人主义恋情的真实描述：偶尔的邂逅，共同娱乐，然后同居，逐渐习惯对方，可是当薇尼由于母亲的去世负疚患上了抑郁症，逐渐变胖，变得怪癖，失去工作，于是马克也换了一个公司，以此离开她。在山眼的小说中，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描写非常冷静客观，不同于《红墙白玉兰》中对西方社会的浪漫主义描写。在《维纳斯的春天》中，各种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孤独，少女怀孕，家暴……许多人没有现实中的朋友，职业性的心理咨询成为人们倾诉心声的唯一途径。男女之间的恋情可以共享乐，不可以共患难。薇尼似乎生活在踩钢丝的节奏中，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坠，失去她拥有的一切。

在薇尼的心理描述中，生存危机是最

重要的思考主题，仿佛自己如果不保持苗条，时尚，有一份好职业，没有人爱是自然的事。所以薇尼在马克离开之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逐渐增加的体重和年龄，她绝望地对镜子吼叫：“我绝对不能失去这个职业，我不能胖，不能丑！”

在这部小说中，薇尼虽然没受到像黛莱丝那样的社会习俗和虚伪道德的窒息，但是社会是冷漠的，人们对别人的生活是不闻不问的。男女在一起的原因是利益相同，一旦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困难和负担，这种脆弱的联盟就会断裂。

女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选择独自挣扎，让自己具有成功美丽的表象，才可能有人爱，有工作，有一切相应的社会地位。她们虽然表面上独立自主，但是已经无暇思考自己的真正身份，追求和幸福，生活中的危机已经将她们压得无法喘息。鲁迅1923年文章“《娜拉走后怎样》也涉及了这样的问题：女性脱离传统家庭的禁锢以后，会面临经济，社会竞争等方面的压力。鲁迅先生精辟地写道：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16]

在现代的西方社会，大部分都市女性已经摆脱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莫里亚克描述的黛莱丝德克罗的命运，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激烈竞争和严重的个人主义给女性带来沉重压力，让她们全部精力都耗费在生存挣扎中。《维纳斯的春天》形象地描绘了女性这样的境况。西方异国的社会环境和不像《红墙白玉兰》在秦小小眼中

那样是一个幸福的桃花源，它是一个陌生的，个人主义的，冷酷无情的“异国”，而且女主角薇尼更多地生活在被动态中，她被动地承受生活的重担，很少对人生，爱情婚姻的意义有认真的思考。

但是她的心理咨询师汤姆却象征着这个冰冷世界里的人性和温情。他似乎并不以赚诊疗费为最终的目的，最后他为了帮助一个邻居死于一次触电事故，在教堂举行的葬礼上薇尼才知道他一生的故事：他当过流行音乐家，出于基督信仰的博爱精神去过非洲十年帮助当地人，离过婚，但是一直关心前妻，并且在离婚以后匿名为她捐出一个肾脏。他当心理治疗师是以专业的方式实现帮助别人的理想，他的倾听不是一种职业化的行为，而是有出于内心的同理心和帮助患者痊愈的善良愿望。他的葬礼出现在小说的结尾，最后一句话讲述薇尼的反应：“没等到葬礼结束薇尼就离开了，她甚至没有机会再看到汤姆的面容。她打开车门心想，去哪里呢，去海边走走吧。”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虽然很平淡，但是说明她通过了解汤姆的一生，也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了。

在这部小说，汤姆的形象丰满而有现实感，他无论是事业家庭还是宗教信仰都经历过曲折和失败，他被人称作“老汤姆”，并不像柳如海那样，家境富足，英俊潇洒，但是他在小说灰暗冰冷的氛围中是一抹温暖的颜色，他无论对前妻，朋友，还是病人，都是善良真诚。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凡人，痛惜自己失败的婚姻，称自己为“失败者”。不过他总是在别人最艰难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无私地给予帮助，他和前妻的关系与薇尼和男友马

克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薇尼的形象也是很具有现实感的，她的生活是现在西方国家新移民普遍的生活经历。在人物塑造和社会环境描写上，《维纳斯的春天》比较接近西方更广阔的社会真实。小说最后开放式的结尾暗喻薇尼面对的问题：我是谁，我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还没有真正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山眼的其他移民小说，比如小说集《青春作伴》（2019）中，她显示了一如既往的现实主义风格，移民的生存艰难在不同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的人生百态在山眼冷静的笔下有入木三分的描述：华人团体中类似速配的婚姻介绍活动，家庭中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残花），异国婚姻中畸形的情感依附和情感勒索关系最终导致的暴力谋杀（青春作伴），在这两部小说中，女性受到的虐待和她们的报复以极端的方式呈现，这种呈现方式和莫里亚克在小说《黛莱丝德克罗》中以谋杀案的极端呈现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用极端案例和行为展示压抑的生活中女性遭受的长期折磨。这在台湾作家李昂的小说^[17]《杀夫》（1983）中也有类似呈现：长期被丈夫残酷虐待的妻子最后用丈夫的杀猪刀捅死了丈夫。

在《维纳斯的春天》中，山眼则采取了相对比较温和的笔触去表现了普通移民的生活艰难，每一个角色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汤姆这个人物的出现也显得很自然，作者对他没有理想化的描绘，但是他的出现为西方社会冷酷的生存环境增加了人性和希望。

3. 语言特色

在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是海外女性作家，都书写了海外女性的生活和情感故事，在语言特点上有一些共同点：心理的描写占用了大量的篇幅。故事的情节相对简单，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细节的具体描述，没有使用历史性的宏大叙述，但是她们塑造的女性形象真正经历的惊涛骇浪是心灵世界里发生的。在早期描写移民生活的影视和小说中，往往更多地使用曲折的情节，时间地点的频繁转换，主人公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怎样挣扎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例如根据^[18]曹桂林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1991），郑晓龙，冯小刚执导的同名影视作品等，但是在《红墙白玉兰》中，秦小小完全没有遇到这类问题，《维纳斯的春天》中虽然对生活的艰难有所涉及，但是王薇妮的经历和西方国家普通国民经历的失业，孤独也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书中没有离奇的案件和情节。施玮和山眼的小说所描述的挣扎发生在另一个看不见的心灵世界，小说以独白，旁白的方式对女性的心理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从她们的经历中，我们也体会了这个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商业化浪潮对家庭的影响，传统和现代的转换交融，海外华人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整个世界所经历的，在商业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变迁。女性的经历是折射这个全球商业化浪潮的其中一面镜子。

结论

近代女权运动争取个性独立，工作中的平等待遇，婚姻的自主，和男性在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这个运动在上个世纪席

卷了整个世界，从而使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在小说《红墙白玉兰》所描述的环境中有充分的体现，无论在趋近现实的中国环境的描写还是在理想化的西方世界的描述中，妇女都是与男性平等，受尊敬和爱慕的对象。

但是在近20-30年中国由于商业化的潮流，女性的美也逐渐被商品化。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下，妇女的身份重新退化到了附庸性的，装饰性的，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上看，一些新词汇的出现反映了这种女性身份的下降，比如，对大龄未婚女性被称为“剩女”，这意味着无论女生的事业是否成功，生活是否平衡快乐有意义，她的唯一标签是她的婚姻状况。

虽然在现代社会，婚姻自主在经济发达地区是一种普遍共识，但是来自商业社会的压力使婚姻和爱情更像一场商业谈判或者开合作公司，虽然女性经济状况的提高让女性在这样的谈判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比封建社会中的父母包办婚姻情况有好转，但是经济状况的独立只是有丰富精神世界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唯一条件。今日在商业浪潮席卷一切的社会环境下，婚姻却可能被完全被商业化，与追求人生幸福的初衷相距甚远，这使女性的身份又重新成为莫里亚克在小说《黛莱丝德克罗》所抨击的状况：空虚无趣，除了活着和追求物质条件以外，没有独立的对自己的身份和精神世界的追求。在商业性婚姻中，双方虽然可以决定自己的对象，但是这种决定常常是源于比较低层次对物质安全感的需求或者双方共同利益的整合。这和封建社会的“门当户对”的利益婚姻并无本质不同。

同时，商业文明和竞争的蔓延，也让

大量的女性陷入《维纳斯的春天》中王薇妮的生活境况：迫于生存的压力，无暇顾及精神世界，对伴侣的选择也没有精神方面的琴瑟和鸣，深层交流的诉求。这在西方都市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这种状况下，男女都是生存竞争，极端个人主义的牺牲品，她们被动地承受残酷生存竞争带来的社会压力，他们“活着”，但是没有“生活着”。

海外华人作家在这些普世关注的问题上增加了一个维度，就是异域的体验，在西方文化中，“找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海外华文作家离开自己的根和环境，可以以比较和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文化，以一种全新的目光和身份去寻找自己，异域生活环境让她们脱离了许多隐秘的，不言而喻的社会规范，得到新的营养和灵感，能够用另一种眼光去看自己，看世界，若即若离地去审视自己的根，这是一个更复杂背景下的“找到自己”，从而使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有了更复杂丰富的性格。这种丰富性在施玮和山眼两位华裔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有丰富的体现：她们以不同的风格描述生活在海外的女性所面对的异域文化冲击，生活变迁，生存挑战。施玮体现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山眼的现实主义风格以不同的角度诠释了海外华人女性面对自己的身份，文化和人生选择时经历的思考。她们塑造的秦小小和王薇妮展现了不同生活环境下的华裔女性对生活，爱情和家庭的理解，读者从秦小小的经历了解了女性在妇女解放运动近百年以后所获得的新的身份和自由，从王薇妮的经历重新审视全球化和商业浪潮给女性带来新危机，并促使我们思考现代女性是否在这样的变化中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独立和尊严。

注释：

- [1] 出自 战国庄周《庄子·齐物论》，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醒来以后不知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还是自己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第 17-41页。
- [2] 出自 柏拉图《理想国》（公元前428/427-348/347）第七卷（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 2015年。
- [3] 莫里亚克.F《黛莱丝·德克罗》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88年。
- [4] 徐真华《跨越时空的人性光辉——莫里亚克对现代女性意识的重构》台湾辅仁大学《哲学与文化》第五期，2013年第25-38页。
- [5]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巴黎杂志1856年。
- [6] 巴金《家》开明书店上海1931年。
- [7] 巴金《春》开明书店上海1938年。
- [8] 巴金《秋》开明书店上海1940年。
- [9] 施玮《红墙白玉兰》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年
- [10] 山眼《维纳斯的春天》台湾道声出版社 台北2014年。
- [11] 施玮《红墙白玉兰》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39页。
- [12] 同上注，153页。
- [13] 霍桑.N《红字》Ticknor & Fields 波士顿1850年。
- [14] 施玮《叛教者》美国南方出版社 Montgomery2016年。
- [15] 山眼《青春作伴》美国南方出版社 Montgomery2019年。
- [16]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作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演讲稿，后收入杂文集《坟》。
- [17] 李昂《杀夫：鹿城故事》（原名“妇人杀夫”）台湾联合报（1983年11月刊）后来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 [18]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后来由郑晓龙，冯小刚执导，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在1994年播出。

（作者单位：美国西北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